

# 蔣公軼事

皮宗敢

## 紀念 蔣公介石九六誕辰作

民國卅年底，筆者時年僅三十歲，在我的生命中發生了一件大事。其時我在昆明當營長，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份電報命令我即日赴重慶應 委員長召見。到了重慶侍從室報到。才知道因為珍珠港事變之後中美聯合作戰， 委座要物色一個

頗多，若干有關國家機密的事情不便發表，謹以下幾件親身經歷的軼事說明一代偉人先總統蔣公偉大的人格與風範。

### 蔣公與史迪威將軍

英文好的軍官充當他老人家的隨從參謀。而侍從室第六組組長我的同期同學唐縱將軍事前也警告了我， 委座已召見了三個人都沒有同意。當召見時 委座垂詢我英文程度如何，當時我可以說是初生之犢，遂侃侃的回答說：「學生在黃埔軍校六期畢業後被資送到金陵大學讀了四年書，金大畢業後又考取了留英。在英國修習軍事四年。英文磨練上多少有點根底。」當蒙 委座點頭稱

關於史迪威的功過得失，戰後出版了若干本專書，有所詳述，筆者不擬重複。只想就個人觀察所及略述我的觀感。當時史迪威身兼三職即美國的中印緬戰區司令、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參謀長以及以後又兼任同盟國東南亞戰區副總司令（總司令為英國蒙巴頓海軍上將）

是，但到了下午四時又奉命「夫人傳見」。委員長夫人只用英語與我寒暄了幾分鐘，然後宣佈說：「委座借我擬於卅一年元月底訪問印度派你為隨從參謀同行，但對所有人員（包括家人）必須保密」。如此，我就走進了委員長侍從室的大門，當侍從參謀，替 委員長辦洋務（自然只是屬於軍事方面的）一直到卅六年夏奉派出任駐美首席武官為止。在此期中我所接觸或承辦的軍國要務

，他統率的軍隊在卅一年春夏之交被日軍擊得一敗塗地，被迫逃往印度。所以他懷恨在心，一心想想滿雪前恥要在北緬擊敗敵人（這也就違背了孫子所謂「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愠而致戰」的原則）為此他很少在重慶留駐。大部分的時間消磨在印度的阿沙姆（Assam）及北緬地區（自然他在 Assam 訓練了精銳的國軍部隊功亦不可沒）。在我當參謀期中很少看到他前來晉謁 委座，商討軍事大計的會談，我只記得在卅三年

夏，日軍發動所謂捷字第一號計畫，集中了五十萬大軍由湘北進犯長沙衡陽，想打通平漢、粵漢鐵路的陸上交通，而危及我在廣西的空軍基地時， 委座召見史氏，想將一部分駐印軍撤回，以抗拒日軍龐大的攻勢，至少也希望駐印軍轉向東南攻擊八莫，以解除怒江附近日軍向昆明進攻的威脅。但他堅持不允。並且說中印公路打通在即，此刻撤兵豈非功虧一篑！其實他以 委員長參謀長的身分應當知道在戰畧上著眼，若是昆明失守了，中印公路的打通對於中國抗戰又有何助益。日軍到達了廣西，即可威脅重慶，若是戰時首都失陷了對於中國整個抗日戰爭是何等大的損失。用一句西方成語他只看到一株一株的樹，而看不到整個的森林。換言之他只是一個很好的師長、軍長的材料，而非一個有識的戰略家。後來日軍果然佔據了桂林、柳州，並向貴陽發展。他唯一的答案是，第一他要求他自己被授予指揮統率所有國軍部隊（換言之就是要代替 委員長兼任盟軍中國戰區統帥的職務）；第二是要武裝中共軍隊命令他們南下抗敵。此點可說他是受了國務院派來當他政治顧問「四騎士」的包圍。此所謂

四騎士就是戴維斯 (John Davies)、謝偉斯 (John Service)、路登 (Raymond Ludden) 以及艾默森 (John Emerson) 而此四君都是反國民黨而親共的 (註一)。史氏那知道所謂請神容易送神難的道理，真正有朝一夕共軍進駐了華南 (那時他們在華北已發展到一百萬人的勢力) 不是如虎添翼嗎！所以有識之士很公正的批評羅斯福總統派史迪威來華是一大敗筆。因為在中印緬戰區的負責人不但需要一個優秀的職業軍人，更需要一個優秀的「政治」軍人，蓋因在本戰區內有美、英、中華民國政府及中共集團四個因素在內。政治上的折衝比軍事上的角力更為重要。不幸的是羅斯福總統派了一位酸溜溜的 Joe Stilwell (小名為 Vinegar Joe) 來代表美國。其失敗豈非偶然！此為中國的不幸，美國的不幸，也是同盟國間的不幸！關於此點在史迪威調職以後筆者參加了一次半官式的 委座招待西方友人的宴會。他老人家當時說：「我自認不是一個不容易相處的人。在北伐時我與俄國加倫將軍處得很好。在改革法幣時，我與英國的李斯羅斯爵士 (Lord Leith-Roh) 處得很好。在建立陸軍時我與德國席克特、福根豪森將軍 (Gen von Seeckt, Gen von Falkenhansen) 也處得很好。在建立空軍時，我與意大利顧問以及美國顧問陳納德將軍也處得很好。但與史迪威將軍實在很難相處！」此非歷史的作弄與悲劇乎！ (註二)

### 蔣公與赫爾利將軍

在卅三年夏 委座與史迪威不融洽的時期，羅斯福總統派赫爾利將軍為其私人代表。一方面處理史迪威事件，一方面調停國共的爭執。赫氏來華途中經過蘇聯，莫洛托夫告知赫氏，毛共並非共產黨，與蘇聯無關。赫氏最初信以為真，所以到達中國之後雖然不是親共，但以爲對毛共可以理論，故奔走於重慶、延安之間，想促進國共合作。後來發覺毛共毫無信義，得寸進尺，就立刻改變了原來態度，成爲反共的急先鋒，赫氏雖然帶著陸軍少將的官階，但他畢竟不是一位職業軍人，而是一位有眼光的政治家。他當過初期羅斯福時代的陸軍部長 (其所屬參謀總長即爲麥克阿瑟將軍) 所以他能明利害，識是非。後來他升任駐華大使與魏德邁將軍合作無間。一文一武共同支持 委員長爲同盟抗日而努力，可稱爲中美合作中的黃金時代。可惜在抗戰勝利時，他回國述職，杜魯門總統也要求他繼任駐華大使，但他在國會中指責國務院的遠東事務負責人 (大概指范宣德 John Carter Vincent) 時擔任國務院遠東司司長) 及大使館的「四騎士」親共，破壞他執行任務的努力，憤而辭職，因而結束了這段中美良好的關係。筆者私認，以赫氏地位的崇高，以及其政治上的睿智，假如他不辭職的話，或者不致於有馬歇爾來華調處的演變。而中美關係逐漸惡化的後果，也許不會發生了。歷史常常是某些突發事件 (Incidents) 的屢積，這不也是一個好例證嗎！

因爲赫氏的政治見解與 蔣公的不謀而合，可說他們兩位老人家很自然便成爲莫逆之交，

蔣公非常喜歡約見他，暢談軍國大計問題，週末時他也常常應邀到黃山或林園 蔣公的別墅休息。記得在三十二年 蔣公五十七歲華誕時，只約了一桌客，主客就是赫老將軍。當時韓國兄及筆者也奉陪末座， 蔣公很高興的指著我們兩人說「赫爾利將軍酒量很好，你們年輕人要多敬幾杯」我們奉諭後飽品官邸佳釀，而老將軍酒量甚濃，餐後還高歌一曲，賓主盡歡而散。

### 蔣公與馬歇爾將軍

馬歇爾將軍於三十四年十二月抵滬，我到機場去接他，一直到三十六年元月離華，我到機場去送他，前後十三個月，他的全部調處活動，我可說是無役不從。我發覺他是一個典型的職業軍人。爲人嚴肅、誠實、自視很高。但現實政治 (Real Politic 或稱權力政治) 不是他的本行。尤其不很懂得外交上的巧妙運用 (Diplomatic Finesse) 而其致命缺點是容易先入爲主，不肯從善如流。上面說過史迪威是受了「四騎士」的蠱惑而親共。同理馬歇爾也是受了史迪威的蠱惑而對我政府存有偏見。因爲史迪威是美陸軍部長史汀生及參謀總長馬歇爾的愛將，所以他們二人對於 蔣公撤換史氏的要求，始終耿耿於懷而不諒解 (註三)。他們不知道史氏內在主張是要推翻 蔣委員長的政權，而建立一個共產政權 (註四)，這可謂是「是而可忍而孰不可忍」的問題，如何能怪及 蔣公呢？但馬氏仍舊相信史氏及其同路人的說法，他到了中國以後，寧願常與周恩來及若干民主同盟份子談話，而不肯接見我政

府政要人士如王寵惠、戴季陶、吳鐵城諸位先生，聽取他們的意見。這就犯了「偏聽」的大錯。因為他偏聽又容易先入為主，所以他懷恨所謂國民黨的「C、C」份子，也不滿一些黃埔將領（尤其是杜聿明及胡宗南二人），他以為這批人都是國民黨內的頑固份子（Reactionary）。

上面說過他自視很高，兼之他地位崇高（擔任參謀總長獲得勝利）。所以他接受了調處國共關係的任務後，就存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心理。我猜想他認為調處失敗就是對於他一生名譽的重大打擊，這是他無法忍受的。因之當他住進上海旅館後，魏德邁據理分析向他直言相諫說：「要促成國共雙方組織聯合政府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當時馬氏即怒言以對：「我將完成我的任務，而你一定要幫助我。」（註五）這就證明了他有一種「蠻不講理」的決心與自信心。後來調處果然失敗了，他就歸罪於雙方的頑固份子。在他心目中以為在國民黨及共產黨內都有他認為好的自由份子，也有壞的頑固份子，而他的任務失敗就是遭受這些頑固份子所破壞的。（Gabhota-be）及至他回國擔任國務卿後，他對國民黨（或者說對國民黨的所謂頑固份子）餘怒未消，民國三十七年共和黨所控制的國會通過了予我一億二千五百萬的軍援案，他也反對。他還兩度的告訴我：「我絕不能向我的政府建議接受中國問題這個包袱。」其實當時美國實行所謂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如火如荼的援助土、希兩國抗共。而對我國抗共事業則坐視不理。我常常想到這豈不是符合了墨子所謂「多見白曰

白，少見白曰黑」的現象嗎？到了三十八年中共差不多要控制大陸的時候，周恩來指摘馬歇爾為戰爭販子，他聽到這項消息氣得發抖（這是魏德邁將軍親口告訴我的。）到了卅九年年底中共軍隊以志願軍的名義大舉參入韓戰。有一天馬氏（他當時擔任國防部長）電召我晉見他，叫我立即回臺向 委座報告，美國將繼續軍經援臺，並且要派遣軍援顧問團來臺。我自然欣然接受此項任務，立即飛臺報告 蔣公。這也可以說他對共匪陰謀有了新的認識，也有了新的覺悟，但他的覺悟似乎為時太晚了一點。

委座對於馬氏可說是待之以誠，也曉之以義。希望說服他認識中共的陰謀與詐計。但在這方面成就並不大。委座常常委屈求全的答應馬氏的請求，例如在若干次數國軍剿共戰事得利的時機，馬氏建議停戰，委座每次都接受他的建議。尤其在政治上馬氏反對五五憲草（註六）而委座向馬氏保證我們不堅持五五憲草而願意實行政協憲法草案。憑良心說馬氏是認為 委座是有誠意的。但他認為 委座的若干部屬沒有誠意，因而導致他調處的失敗。我們不能諱言當時在重慶發生了所謂較場口事件，也有人去搗毀新華日報，這不是反面證明馬氏懷疑的正確性嗎？所謂小不忍可以亂大謀，這是我們應引以為戒的！我私付假如當時美國派來調處的人不是馬歇爾而是艾森豪將軍或者是麥克阿瑟將軍或者是民主黨巨擘哈里曼先生（Averell Harriman 他在二次大戰時當過駐蘇大使）或者中美關係更會好轉一點，因為以上三君不管在政治認識上或者外交運用

上都比馬氏高明得多。我們不可低估馬氏的才能，但他畢竟只是一個卓越的軍事戰略家，而不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不知讀者諸君以為然否！

### 蔣公與魏德邁將軍

魏德邁將軍不但是 蔣公的好友，並且是一個很忠實的部下。他於三十三年秋來華接任史迪威的職務後，只兼兩職即美軍的中國地區司令官及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參謀長二職。他將印緬作戰的任務交給他的部屬薩爾頓將軍（General Daniel Sultan）全權負責。所以他能長駐重慶。幾乎每天下午都來 委座官邸商談重大軍事問題（每次都由筆者通譯）。他也建立了中美聯合參謀會議，每週開會一次，共同商討整軍及反攻問題。（對照史迪威既不來請示 委座，更不理會中國參謀本部存在的作風。）他深深知道他的職責是要協助 委座及中國軍方，在七年艱辛抗戰之餘，要重整軍備恢復戰力，才能繼續抗戰下去。如此對盟軍利益而言，就可牽制日本在華的一百多萬軍隊，以免其可以抽調去打尼米茲、麥克阿瑟以及蒙巴頓（註七）。他就任以後，第一件事就是與 委座商定動用美國的大量運輸機空運湯恩伯的部隊由陝西增援貴陽前線，立即穩定了當時的戰局。他並且派遣顧問軍官到準備反攻的每一個師部，告誡他們必須通力與我方合作，他還以 委座參謀長的身分，親訪每一個戰區，對中美將校加以鼓勵與指導，真可說是席不暇暖。（我還記得隨侍他通過敵佔領區衡陽上空，到茶陵與薛岳將軍會談的緊張局面

，以及薛將軍猛講廣東話我又聽不大懂的窘狀。因爲他的不斷努力，以及 委座對他的全力支持，可說在他到任後半年（卽三十四年春）國軍的戰力與士氣都大大的提高了。他常常很驕傲的說：「中國軍隊只要有良好的領導、補給與訓練，是不遜於任何人的。（Second to None）」筆者又有一個遐想，假如在珍珠港事變之後，馬歇爾立即指派來華的美國司令官就是魏德邁將軍的話，則中國戰區的情形可能大爲改觀！

關於魏德邁將軍與 委座合作無間的事實，



先總統蔣介石與本文作者合影。

要說的很多，我只想舉兩個例子來加以說明。第一件是在三十三年秋日軍已迫近貴陽時，魏將軍向 委座建議遷都昆明。他的理由是得到情報，日軍在漢口集結了兩百多架運輸機，可能配合地面進攻而空降重慶。所以不如放棄重慶，遷往昆明則可賴駝峯補給繼續抗戰，以免作階下之囚。當時委座正言的向魏氏說：「魏德邁將軍，過去幾月來凡是你向我的建議很少我沒有同意的。至於你建議我遷都之事，我絕不考慮，請魏將軍不必再多說了。」魏氏也從善如流，以後絕不談及此事。第二件是在卅四年春，我反攻已漸成熟時，委座召集全國所有的戰區長官（都是上將）來渝聽候指示。當委座介紹魏將軍講話時，他老人家說：「魏德邁將軍（他當時只是中將）是我的參謀長。他說的話就是代表我的命令，你們一定要服從他。」魏氏也感激知遇之恩奮力圖報。政府遷臺後，魏氏亦曾數度來臺晉見 蔣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貢獻他的意見。而 蔣公對他也非常禮遇，促膝談心，每次都在兩三小時以上。

蔣公崩殂後，有一次機會我遇到魏氏，他很有氣憤的說：「委員長逝世了，國務院派在臺灣悼唁的名單內沒有我的名字。這是何等令人氣憤的事情！」這也可見得魏氏對 蔣公哀思之切。

### 蔣公的另外幾位諍友

除了赫爾利、魏德邁之外，我發覺 蔣公還有三位外國諍友。一位是英國的魏亞特將軍（Gen. Carton de Wiart）他是一位獨眼獨臂傳奇性的人物，曾經參加過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度被任爲英國援挪司令官）他的身分是邱吉爾首相的私人代表。因爲他在東歐度過很長久的歲月，深深知道共產主義之邪惡，所以很同情 蔣公的政治主張即抗日之後，應當平亂，統一國家。因之蔣公也常常請他來談抗戰與建國問題。此外是他不私自。當三十三年冬，日軍迫近貴陽時，魏德邁將軍建議將遠征緬甸的兩個精銳師調回國內，英國蒙巴頓將軍自然極力反對，但魏亞特將軍以爲魏德邁將軍的主張是正確的，終於商定了將該二師調回。第二位是奧德隆將軍（Gen. Ordron）他是加拿大首任駐華大使，當時各國駐華的大使很多，但他似乎忘記了他大使的身分，因爲崇敬 蔣公之故，常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向 蔣公貢獻意見。當他聽說美國要派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處國共問題時，他就勸 蔣公不要接受。他的意見是調處一定不會成功，一旦失敗之後，美國政府或馬氏本人必歸咎於國民政府，甚至歸咎 蔣公。所以馬氏來華之舉只有害沒有利。（筆者在某雜誌看到黨國元老陳立夫

先生也有同樣的見解。) 與將軍雖已逝世很久，我仍舊很懷念這位推崇 蔣公愛護中國的國際友人。第三位是浦立德先生 (Mr. William Bullitt) 浦氏本為羅斯福的紅人，曾任美駐蘇及駐法大使，以他銳敏的觀察，深知史大林為人陰險，戰後必為美國之敵。所以他極力反對羅氏親蘇的政策，到了三十七年冬，共匪至為猖獗時，他投入共和黨陣容來華考察。回美後在生活雜誌 (Life) 發表長文，主張應派大量顧問人員及動用龐大經費援華，以挽狂瀾。但其主張未為民主黨政府所採納。政府遷臺後，他曾數度來臺作 蔣公上賓暢談天下事，而且還在西子灣蓋了一所別墅。過了幾年，因為他身體不好，就沒有再來臺灣了。

### 惠承恩澤幾件小事

最後我想說一說關於我個人的兩件小事。第



民國四十八年本文作者的母親楊太夫人不幸逝世，蔣公親題教子有方致唁。

一件是當我於四十一年奉命自美調回的時候，我曾電呈 蔣公說在回國之前，想先就便進美國指揮參謀大學深造，但得到他老人家的回電說「吾弟出國已久，應即回國服務，入學事以後再議可也」。奉命之後我即挈家室兒女立即返臺。關於入學的小事也忘記了。但在三年以後，我當國防部連絡局局長之時，忽蒙 蔣公召見，他老人家問我說：「以前你想入美國參大受訓未果，現在美方為國軍將領在參大設立了特別班，你願不願意前往受訓？」我自然說我非常願意去。回想起來以 蔣公日理萬機之餘，在三年以後還記得我想入學的小事而成全我，這是我畢生難忘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是在四十八年我由香港親友處得到了家母在大陸逝世的消息。我就在中央日報登了一則訃告，只說家母過世了，並沒有說在何處開弔。第二天官邸的侍從武官來電話說 總統知道你母親過世的消息，願意知道一點情形 (家母在重慶也會會見過 委座)，所以我立即向他老人家報告，家母是因癌症而死，享年七十五歲，但不擬開弔。他老人家說，不開弔也好，到了返回大陸再開弔也不遲，辭別前我要求他老人家替家母題幾個字作為紀念。並且說明家母閨家姓楊。過了半個月沒有消息，我以為他老人家忘記了，但再過幾天，總統府送來 蔣公親筆的題字「皮母楊太夫人千古：『教子有方』 蔣中正敬題」。這幅墨寶現在我仍很榮幸的懸在我客廳的正方，由以上兩小事可見得 蔣公對部屬培植愛護的深情大德。在此處我必須說明一件我畢生遺憾與自我懲咎的事情，就是於六十二年應新加坡大

學之聘為客座教授。民國六十四年三月底我奉派代表新加坡大學參加美國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所舉行的戰史研討會，要在會中發表論文。正在此時得到了 蔣公崩殂的消息，因為日程限制無法趕回奔喪，雖然我在臺灣期中每逢農曆新年都到慈湖 蔣公靈寢前叩頭賀歲，但仍彌補不了我內心的愆尤。後記：

本文註二中說明了我的日記與手本都在大陸上遺失了，所以本文所述的事實都是由記憶中而寫成的，筆者不文，因此不想發表任何文章，但想到 蔣公對我知遇之恩，若現在不寫，以後記憶愈加模糊，更無法動筆了。所以恭撰本文，敬獻于 先總統蔣公在天之靈。本文所敘述的都是筆者親身經過的事實，絕非虛構。但在年月日時以及經過詳情容有訛誤，深盼讀者諸君多所教正。

註一：見 Wedemeyer Report, Ch. 21.

註二：筆者日記因大陸淪陷而喪失，所以 委座當時講話的年月日無可稽考，但所述事實是筆者親耳聽到的。

註三：見 Wedemeyer Report P. 341.

註四：見 Lohbeck: "Patrick J. Hurley" P. 305.

註五：見 Wedemeyer Report P. 363.

註六：五五憲草是民國廿五年國民黨所訂的憲法草案

註七：見 Wedemeyer Report P. 291.